

喻国明 自选集

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

新
闻
传
播
学
名
家
自
选
本

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

喻国明自选集

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喻国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
(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
ISBN 7-309-03997-1

I. 喻… II. 喻… III. 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058 号

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
喻国明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章永宏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浦东东联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7.25 插页 3

字 数 354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3997-1/G·528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03

喻国明学术档案

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于上海市。1979—1989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得学士（1983年）、硕士（1986年）、博士（1989年）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分别任讲师（1989—1991年）、副教授（1991—1996年）、教授（1996年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艺委会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或客座研究员；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关于“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选择的多维性理论以及对中国新闻改革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的分析等，都是极富建树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不少概念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基本“话语”而被收录到有关学术辞典和专业工具书中。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进一步转入将学术前沿的理论与现实的传播实践接轨的方向上来。一方面广泛吸取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做了大量把握中国传播实际的极有认识和操作参考价值的调查研究项目，有针对性提出了“必读（视、听）性”的概念；引进了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的概念；提出了传播产业的本质是一种“影响力经济”的概念并给予了论证，等等，这些都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指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1986年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已主持进行了130余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广泛社会影响的舆论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查研究项目，并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文汇报报业集团、《深圳商报》、《长江日报》等媒体有许多成功的市场定位和竞争策略方面的调查研究和策划合作，被誉为“媒介军师”。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1993）、《中国民意研究》（1993）、《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1996）、《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2001）、《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2002）、《传媒影响力：传媒产业的本质与竞争策略》（2003年）。另有2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曾经两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学术论文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奖励，是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的入选者。

序

新闻传播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门类中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传播学引起关注和广泛研究,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由于新闻传播学者们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从无到有,由附属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变成了独立门户的一级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新闻学理论、新闻史、新闻法治、新闻职业道德、广播电视和舆论监督的研究,全面铺开。新闻理论的研究也由纯党报理论的研究,扩展到一般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传播学的研究,则外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相渗透,内与新闻学相融合,也有了很大发展。传播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以及传播舆论学、符号学的研究等,都受到人们的关注。新传媒的研究、媒介经济的研究,也开始成为热点。新闻传

播学已经进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多角度学术发展的阶段”。

中国新闻传播学今天的繁荣发展,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薪火相承,代有传人,各领风骚若干年。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堪称名家,都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过贡献。

纳入这一系列“自选本”的作者们,则是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新一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他们大多来自高校或其他教学研究岗位,都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界某一个方面的领军人物,都是术业有专攻,腹笥丰硕,蜚声于时的新闻传播学界的佼佼者。和他们的前辈们比较起来,他们这一代的“名家”们具有以下的特点,即:一、具有较深厚的人文理论根底;二、具有较合理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三、具备必要的学科前沿知识;四、思想活跃,不刻舟求剑,不作茧自缚;五、接受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接受过中西文化交融的浸润,具有较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是开拓创新的一代,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代。

让新闻传播学的“名家”们出“自选本”,这是一个很好的出版创意。首先,都出自“名家”。既是“名家”,就有了一定的质量上的保证,避免了在数量众多的新出的各类专著中,挑花了眼或挑走了眼。其次,都出自“自选”。既是“自选”,选出来的,必然是个人满意的自认为可以传世的精品。不会灾梨祸枣,不会误人子弟,也可以大大减少读者和学子们的经济负担。这对社会,对学术,对文化的发展,都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我祝贺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的问世,并相信它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新闻传播学者和学子们的关注和欢迎。

才 华 秀

2004年2月19日于北京宜园

主编絮语

这套《新闻传播学名家自选本》有学界巨擘方汉奇教授赐序,不必主编赘言。这里仅就创意初衷、入选条件及编辑原则等说几句话。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革”逝去不久,曾经主张“新闻无学”的代表人物检讨了自己的无知。首都新闻学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先后问世。在这良好氛围中,中断许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又得以重新展开。新旧世纪之交时刻,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进入新世纪以来,每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学著作以百计,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千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期。

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日益深化与二、三级学科不断延伸,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学术领军人物应运而生。他们中间有王中、甘惜分、李龙牧、方汉奇、张隆栋、宁树藩、丁淦林、赵玉明等一批学界元老。他们是新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开创者、拓荒者。他们有的提出了崭新的理论体系,有的著作等身,有的

向国人较早介绍新的新闻传播学说,有的以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学科建设……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新一代脱颖而出。新一代领军人物是在改革开放洪流中诞生的,他们在继承老一代学者理论、学识、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发展。本辑自选本的八位作者是其中的首批代表。

编辑出版新闻传播学名家学术论文自选本,有这样几方面的需要。一是检阅新一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研究成果,展示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业已达到的新水平。二是系统介绍新闻传播学研究新的领军人物的研究领域及其在这些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沟通与互补。三是为新闻传播学年轻学子了解自己导师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方法提供一个平台。由于各种原因,刊载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的刊物既少又分散,阅读这些论文有相当困难。

对于被邀入选自选本的名家,总体上有这样几方面的考虑。他们一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某一专业或某一研究方向的领军人物,二是有一定的全国影响,三是在岗博士生导师,四是他们有着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鉴于符合这几条的学者全国有几十位之多,我们编辑此类自选本又无经验,计划先出第一辑,首邀八位名家入选。

既然是自选本,当然应尽显个人风格。但作为丛书,又需要有相近或相同之处。经八位作者商定,作为组成丛书的各自选本共同遵循这样几个要求:一是尊重历史原貌,对入选文章原则上不作更动,仅限改正错别字等一些技术处理。二是内容安排上每本有一帧作者照片,一段学术档案,一篇访谈录一类的文字,作者谈自己治学的经验、心得、体会。三是每本掌握在30万至35万字左右。

最后,作为主编,我要代表入选的八位作者,向我们的导师表示敬意,没有他们的栽培,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向我们的学生表示问候,正是他们的勤奋努力,成长成才,才显示出我们劳动

的价值。向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表示感谢,由于他们所提供的园地和机遇,我们这群书生才得以出版自选本,对自己走过的路程进行一番检视和反思。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读者对于这套丛书的批评。我们将根据读者的意见使这套丛书的未来几辑更臻完善。

童 兵

二〇〇四年春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前言：别无选择

——记我的二十年学术生涯

1983年4月我完成了生平第一篇算得上是学术论文的文章，它就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从那时算起，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春夏秋冬。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美意，约请我出版一本自选文集，使我有机会回眸梳理一下自己这些年研究的逻辑线索。

记得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到一位富家小姐——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从小锦衣玉食，奴仆成群。1949年后她留在国内，在经年不息的运动里，沦落到下乡挖鱼塘清粪桶。很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什么都改变了，包括她双手的形状。但是，她竟然还要喝下午茶。家里被一次次运动扫荡，一贫如洗，烘焙蛋糕的电烤炉早已不见了踪影，怎么办？她自己动手，用仅有的一只铝锅，在煤炉上蒸蒸烤烤，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条件下，巧手烘烤出西式蛋糕。就这样，悠悠几十年，她雷打不动地喝着下午茶，吃着自制的蛋糕，怡然自得，浑然忘记了自己身处逆境，悄悄地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幸福。看过

这段文字之后,我便很是生出些感慨来。其实,世界上有两种坚强:第一种是坚强在肢体皮肉上,宁死不屈式的,像渣滓洞里的江姐、许云峰;第二种坚强不在皮肉上,而在生活习惯里,无论顺境逆境,都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如这位富家小姐。哪怕幸福只露出了一根线头,她也有本事将它拽出来,织成一件毛衣。

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在的体制到我们的灵魂。改革与时代遭遇,我们与改革同行。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追随改革、投身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人生理念和近乎宗教般的研究主题。当我面对自己的七本专著和三百余篇昔日文稿的时候,我从那些已经有些泛黄的书页中感受到的是自己二十年来对于中国传媒改革事业痴心不改的情愫。

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传媒业)投身改革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而我们作为对于这个社会深怀责任感的学人对于改革理论与实践的追随也同样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必然。我是在一种深深的焦灼感中写作《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的;当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特征是眼睛向下的经济和政治时,我们进行了《中国民意研究》和《解构民意》的努力,试图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工具;“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出于这样一种责任感,我们记录了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嬗变的轨迹》;而当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写着中国传媒理论和传媒实践的发展样式的时候,我们写下了《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和《传媒影响力:传媒产业本质和竞争优势》。

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每个40岁朝外的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面孔负责。”他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未成年时,人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的生理面孔,这副面孔的美丑主要应由他的父母负责;但是当一个人成年以后,人民更多地看

到的是他的社会面孔，而这副面孔的美丑则主要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中国有句俗话说叫做“不识其人观其友”，意思是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一个人交什么样的朋友就可以大致判断他的旨趣和为人。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我们不妨说，要认识一个学人的深刻与浅薄、扎实与肤浅、高尚与猥琐等等，也有一个简单直观的办法，就是观读其文。因为对于一个学人而言，自己笔下的文章就是自己社会面孔的真实展示。这里，我仅摘录若干自己已经出版的著作的前言后记的片断，来表达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旨趣和追求。

学术历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形而上”的学问是以学术逻辑为本位的，关注的是学术本身的范式和进展；“形而下”的学问则是以社会操作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一种描述、解释与控制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学问。一个优秀的“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足以使人学史留名；但一个好的“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却往往如同空气、雨露和阳光，尽管可以滋润社会于一时，但却是极易在时间的隧道中丧失其价值的“易碎品”。这是一个选择：是追求“永生”，还是甘愿“速朽”？说实话，任何真心做学问的人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追求“形而上”的原始冲动。但是，处在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无法置身于世外。实践的巨大渴求足以让任何一个对社会深怀责任感的学人无法安坐于象牙塔内，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仅仅贯注于“形而上”的伊甸园中。于是，我们别无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我们要做的，就是像寓言中那位捧出自己的心去照亮前进之路的丹柯一样，让自己的研究在经世致用中实现它的价值。

——引自《解析传媒变局》

很小的时候，伏尔泰的一句充满战斗豪情的名言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

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蝶上一样。”记得那时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掌握着具有如此魅力的格言的仁人志士。十几年前,当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次采用现代民意测验的方法将散漫的、看似无序的,甚至十分孱弱的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以一种客观、系统、科学的方式加以聚焦化呈现,并产生巨大社会效应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种顿悟:民意测验方法不正是我在苦苦寻觅的一种现代“格言”吗?近代以来,没有人不在表面上遵从民意——即使是一个独裁者。但在民意测验方法没有产生之前,民意却常常像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在居心叵测的政客的言辞里变幻着自己的面貌。所幸的是,民意测验方法为我们戳穿那些假借民意的“蝴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大头针”。

——引自《解构民意》

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现实恰如一座五光十色的矿藏,每个人都可能从中找到自己欲求的对象。一次偶然的机会,曾经听过一位摇滚乐手的演唱。他的名字已经有点记不清了,但他振聋发聩地唱出的歌词却长久地震撼着我的内心:“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是的,在一个充满着物质欲求的社会里,总还是需要有一些人能够站在超乎个人功利的立场上为社会的发展审时度势,关注和思考一些更为深刻和长远的事务。这些人来自何处?我认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只是在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1467页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对此定义,我一直持深深的怀疑态度。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外国人的书中找到了答案:所谓知识分子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

的亵渎与怀疑者。面对这样一个定义,我常常反思自己:配得上知识分子这一称谓吗?

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转型与变革的世纪——从文明序列上看,它处于两大文明板块的衔接带上,前一个板块是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极权主义的板块,后一个板块则是一个难以成形、欲说还休的理想主义的板块。两种板块不仅在二十世纪开始接触,而且在二十世纪彼此冲撞、挤压、纠结、反弹。只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空间毕竟太狭小了,实难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于是,这一冲撞所导致的混乱与无序,中断与重建,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本书所记录的便是跨世纪之际,中国民意形态的五光十色以及我们对此的思考和判断。或许它对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秩序混乱的新世纪入口处保持社会发展的方位感,有着些许帮助和启示。

——引自《解构民意》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在分析问题中,最好的方法是从结果开始,然后及于前提。”他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技巧,而且也是一种价值关怀:从结果中去考评你的话语权的使用方向。事实上,在我们所要表达的各类话语中,每一话语的社会指向和社会权重是不同的。必须从社会影响和发展全局的角度来考量如何使用好我们的话语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话:“我认为测验一个思想家的价值,在于他对他时代中重大事实的眼光。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他是否是一个擅长定义与分析、设计体系和原则的聪明的建筑师,他的著作或者直觉是否表达了时代精神的呼声。一个不能同样领会和掌握现实的思想家决不会是第一流的思想家。”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已经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在这两股力量之间,学界的力

量日益彰显出来。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改革思想始终拒绝平庸。为中国的发展廓清视野,在终极目标的关怀下提供建构式前进的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它需要我们有真知灼见,更需要我们有冲破利益羁绊的勇气。吴敬琏之所以被人们两度选为经济界年度风云人物,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什么惊世骇俗的大道理,而在于他的真诚和勇气。其实,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对于社会有着深刻关怀的学者不像普通人一样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我们不是思索的机器,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装置。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痛苦中分娩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社会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不幸乃至我们的生命。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我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至少,我们应该和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这是一种底线。当然,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和改革路径的选择特点,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社会改革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困顿之处。于是,我们今天仍然不得不重复着若干年前就讲过不止一次的话,而早几年就提出的观点总还是让人感觉新意不减,似乎我们在原地踏步。其实不然。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十分浩大的社会工程,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又使我们当年看起来颇为重要的改革一推再推,进入一种胶着状态,以致让我们不得不陷入一种“复式”语境之中。事实上,社会的发展需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积蓄力量,这种状态的僵持实际上有着深层因素的较力,这种时候最需要我们拿出自己的眼光和智慧来助力。千万不要无所作为。

——引自《解析传媒变局》

我欣赏和追求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我们不愿

意给学术披上盛装,因此竭力避免与那些总是乐于用曲高和寡来诠释学术水平的人遭遇。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尘封的理论搬入广场,放置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学术应该是透亮的,像阳光那样,照亮大多数人的生活。”我们过去的理论有太多的卡拉OK,在现实面前显得灰暗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社会的渴求和现实的学术逻辑,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研究者都不应该过于任性。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名医孙思邈将这篇《大医精诚》冠于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之首,提倡为医者必须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其实,任何一个有着专业主义追求的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谓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的信念,是一系列规范知识分子工作的职业伦理,是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是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对一个专业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用喜欢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任何一个希望卓越的从业者有一种为之献身的勇气和决心。我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尽管有时候也有挫折感。但这更凸现了它的弥足珍贵。因为我相信,我所热爱的这项事业是民主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是研究者的人格化体现。因此,优秀知识分子的第一特质是境界,是作为学者的专业主义追求。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社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融入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关注和融入,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才能有效地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显然,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的研究成果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单”联系在